

回復香港的流動性

劉迺強

香港的社會的流動問題

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之下，國家之間的貧富懸殊拉近，但在國家和地區社會內部，收入不均卻有加劇的傾向。日本一本暢銷書《下流社會》(注 1)，作者三浦展提出中產階級的分崩離析，中產階級向下流動的走向。另外一本由日本著名策劃大師大前研一著的《M 型社會》，更形象地認為社會收入分佈由一個鐘型過度為 M 型(注 2)。這個問題，在香港也逐漸顯著，最常見的說法是回歸 10 年，香港人均 GDP 上升了，但家庭收入中位數不升反跌。社會流動性的問題，最近在立法會中展開動議辯論，在特區政府的策略發展委員會中，也就此作專輯討論。特區政府根據幾份本地學者的研究報告，認為香港仍然是一個具有相當社會流動性和提升個人社會階層的城市；但卻承認社會不平等，會妨礙底下階層往上流動(注 3)。

在開始討論之前，我想先厘定一些概念。首先，社會流動問題基本上只指向下流動，或者缺乏向上流動的問題，因為向上流動根本就不是問題。這樣一擺，就很清楚這是一個主觀問題，我們主觀上要求社會有足夠往上流動的機制和機會。社會收入和財富分配越不均，中產階級越收縮，從下往上流動的機會便會越窄；因此，流動性問題和社會不公，其實只是一個錢幣的兩面。社會不公是有很多數字反映的客觀現實，而社會流動性則是一種難以具體捉摸的感受和對前景的判斷和反應。事後的研究，是無助解決當前的感受的。社會不公長期化，或者有惡化的傾向，自然阻礙向上流動，引起恐懼。對當事人來說，這些感受是真實的，而政治就是感受，因而轉化為政治問題。當然，在經濟增長緩慢，而貧富懸殊擴張的情況下，流動性問題就更加突出。而這正正就是香港當前的情況。

整體而言，香港的社會仍然有一定的流動性，但是無可諱言，部分市民的流動性卻明顯不佳。一般認為香港在國家欣欣向榮的大環境中，一如前特首董建華就職時的名言：“國家好，香港更好”。但是回歸十多年的經驗，一些市民的處境反而比以前差了。在基層，不少產業工人於香港工業北移的初期，北上成了“師傅”和中級管理人員，但於過去一段時期，被內地人員逐步替代，回流香港之後，收入大減。同樣道理，由於香港港口的地位於回歸後急速下降，貨櫃車司機等物流業人員也大受影響。中產階級見到回歸之後，專業職位增加，但行政管理職位收縮。而與內地經濟發展一無關係的工種如公務員、教師、社工等，基本上不覺得“國家好，香港更好”，這大概可部分解釋不少於政府和半政府機構、NGO 工作市民有較大的怨憤。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從實行學校分區派位開始，香港教育資源的分配日趨不均。自幼稚園開始，名校挑家長，小朋友要花錢弄一份 1 公分厚的“簡歷”才有希望入圍。今天香港中學 500 家左右，其中國際學校 16 家（超過 70% 學生是本地人），英基學校 8 家、私立中學 9 家、直資中學 49 家，即約有 1/5 的中學學位是只有能付得起昂貴學費的家庭才能進入。這些學生除了生活環境良好，營養充足之外，日常幾個補習老師，琴棋書畫無所不學，假期不是這裡交流，就是那裡遊學，而且不少都在外國大學畢業，社交圈子非富則貴……你是大公司主管，你也會雇用他而不要那個來自天水圍，中環也未到過幾回，一出口便知缺乏“優雅”文化的小子。事實上，香港的有關研究更顯示，跟外國經驗不同，隔代貧窮在香港有加劇的趨勢。我們可以說，對上世紀 80 年代前出生的人而言，社會較開放流動是事實，但對“80 後”來說，是另一番世界。

流動性是局部的尖銳矛盾，是未來的大問題；對任何政府，這都是一個不能忽視的重大社會和政治問題。而這個問題在香港已經尖銳化和明顯化，特區政府不能不盡快面對。

流動性不足也好，貧富懸殊也好，社會不公也好，其實都指向一個問題：分配。香港的分配出了大問題。眾所周知，2006 年香港的堅尼系數高達 0.533，是全球發達城市之冠；今天這數字恐怕只會更高。與此同時，香港卻又出了大量世界級的富豪，其窮奢極侈的生活、巧取豪奪的手法，天天出現於傳媒中。

流動性下降感受增強的原因何在

在我經驗中戰後的港英管治年代，縱使是 50、60 年代，經濟發展緩慢，市民生活痛苦，但普遍都有一個創業興家的夢，都會認為在香港，只要有本事，自然會向上流動。我們只會崇拜那些發達的富翁，以他們為榜樣和奮鬥目標，而決不會妒忌他們、仇恨他們。真的也好，假的也好，大家都覺得有希望，有奔頭。之後 70、80、90 年代，經濟發展快速，周邊人人都過得比以前好的實例，這種希望感更加實在。

但是無可諱言，這種普遍的希望感，是港英政府刻意構建的成果。賽馬會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它在不停的頻密製造大小富翁，而且過程是隨機的，人人有份，絕對公平。在施政方面，港英無疑是偏袒英資，但是英資自成一國，以國際貿易投資為主業，與其他人沒有正面的利益沖突，反而相得益彰。他們也做地產，但都集中於某一小地段低調而漂亮地大幹，如置地只做中環甲級寫字樓，太古做特大項目。殖民地政府有無上的權威，它會平衡各方利益，分配雖然不均，但不會太差。尤其是自 70 年代開始，麥理浩主政的十多年，公屋、居屋、9 年免費教育、綜援等一系列措施，為廣大市民建立了一個頗為完善的社會保障安全網，讓大家

都能分享到經濟發展的好處，香港人普遍感覺不會有失醫、失學、餓死人的事情出現。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後，13年過渡期間，以國際貿易投資為主業的英資撤退，空間陸續由本地的地產財團填補，而房地產有關的收入和稅費等，也逐漸成為政府的主要財政來源。發展到今天，不知不覺之間，香港事實上是為地產財團利益而發展的，連特區政府都被他們騎劫，看他們的臉色，成了他們的附庸。幾個長期在小小的香港吸收滋養，成為世界級的富豪，但至今沒有幾個成功踏出鯉魚門，仍舊呆在這一潭小水中猛吸，時至今天，除了衣之外，食、住、行、通訊、娛樂，全都是他們的天下。剩下來的狹隘空間，中小企業挨貴租、貴工資，能撐住的，已經了不起，更遑論前途希望了。打工的，工種越來越少。在中小企業工作，條件差，不穩定，機會少；在大企業工作的，上邊一層復一層，不知前途何在。

創業嗎？不說機會成本高了，絕對成本也挺高。美國創業還有車房，香港小本經營，只能做個小商鋪，全年無休，去洗手間還要掛個牌在門口，趕快完事。好不容易挨它兩年，又要加租了。中間如有少許的機遇，地產財團馬上以餓虎擒羊之勢霸佔了。君不見飲食零售的商鋪全部連鎖化，小店則此起彼落。在以前，失業還可以擺地攤，今天連這個都不可能了。

房地產利益，造成了香港社會的不公，和流動性下降。它更擠走了中小企業和小商販的生存空間，窒息了香港經濟活力。

今天香港問題的關鍵所在

中央稱“維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這對香港很多人來說，一天比一天空洞，在不少人的感覺上，這裡一點都沒有香港市民的份兒，只不過是保證這隻鵝繼續生金蛋的手段。先不說公務員、教師、社工等好一大批人沒有直接享受到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紅利，以及另一批北上回流，風光不再的“師傅”和往日夜夜笙歌，月入5、6萬元的貨櫃車司機等，整體而言，日子比以前差的大有人在。

我是最早提倡年輕人北上發展的(注4)，但已多年不再提了。試想一個大學畢業青年北上，數千元的工資，不但養不起香港的老人，連剛畢業便背上的十多萬元學生貸款都還不了。過去20年的“三高政策”，已經使青年們只能困籠於香港，作困獸之鬥。“80後”鬥“50後”的說法之所以有市場，就是這個道理。他們有些人索性來個一拍兩散，不如大家都乾脆不發展好了。我們不要以為“50後”跟“80後”有基本矛盾，“80後”其實都是“50後”的子女。“80後”的許多問題，如買不起房子等，終於會影響到“50後”的利益。“50後”不單會同情“80

後”，終於還會跟他們站在一起爭權益。

說了這許多，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今天房地產利益已經成了香港的主宰，特區政府失卻了平衡各界利益的能力和地位。於是，矛頭往往就直指特區政府；從最近一些事件的表現顯示，香港有越來越多的人是徹頭徹尾的不相信政府，不相信政府所做的任何事。這股反對派的論述是：這個政府不代表我們，只代表財團利益。原因是它不是我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社會不公是不民主的產物；並且天真地認為民主萬能，只要實行“真普選”，選出來的特首和立法會議員便會扭轉局面。而沿著這簡單的邏輯推下去，香港的不民主、不公平政制，是中共給香港定的，因而他們也表現得十分反共。弄到今天什麼又“起義”、又“解放”的，已經矛頭直指中央。

內地地方政府初嘗賣地作為歲入主要來源，但很快出現大問題。香港在這條歪路上走了 20 多年，房地產利益盤根錯節，更難收拾。而董建華在這裡栽了一個大跟頭，更使後來者引以為戒。不過這個問題是不能不面對的，社會不穩定，房地產也必然會受影響，甚至連某些富豪個人的安危也會受到威脅。

稍有遠見的財閥都會明白目前的狀況不可能持續，主動配合改革不但能讓他們在香港這個他們發家的地方留下美名，而不被咒罵，內地政府也會歡迎一些較懂大體的發展商在更廣闊的舞台上大展拳腳。最近北京高調地處理盈科地產圈地不開發事件，是一個十分清晰的訊息。巧取豪奪，到哪裡都是不得人心的。

(注 1) 三浦展：下流社會——一個新社會階層的出現。譯者：陸求實，戴錚。文匯出版社，2007 年。

(注 2) 大前研一：M 型社會：中產階級消失的危機與商機。譯者：劉錦秀，江裕真。中信出版社，2007 年。

(注 3) 策略發展委員會文件：《香港的社會流動》，CSD/FD/1/2010，9-10 頁。

(注 4) 劉迺強：港燦逃荒。《信報》，2001 年 1 月 14 日。

(《中國評論》2010 年 5 月號)